



在博士培养等权力较为“自由”的师生关系中,如果导师在制度上处于“失控”状态,其性格必然乖戾、其脾气必致嚣张、其作为必会失衡。

□邓海建

□斯涵涵

在飞机上违规使用手机,属于“危及民用航空安全和秩序的非法干扰行为”。但是,在国外飞机上使用手机上网已经非常普遍。两种截然不同的处理方式和行为后果,让人们非常不解与不满。

航班解除手机禁令标志进步

东航17日发布关于《东航机上便携式电子设备使用规范》的公告,标志着东航率先按照中国民航局《大型飞机公共航空运输承运人运行合格审定规则》第五次修订、《机上便携式电子设备(PED)使用评估指南》相关要求,正式形成东航的“落地细则”。(1月17日《经济日报》)

1月16日,中国民航局发布了《机上便携式电子设备(PED)使用评估指南》,17日东航就发布关于《东航机上便携式电子设备使用规范》的公告,可谓是雷厉风行,落实迅速。

在国内的航班上,飞行前“请关闭手机”是乘客常听到并必须照做的话语,《中国民用航空法》还规定,在飞机上违规使用手机,属于“危及民用航空安全和秩序的非法干扰行为”。但是,在国外飞机上使用手机上网已经非常普遍。两种截然不同的处理方式和行为后果,让人们非常不解与不满。

现在,国内飞机上也可以玩手机了,小小禁令解除折射科技进步。玩手机会干扰航空信号,造成航空隐患,这是禁令施行多年的权威解释。然而,研究表明,手机信号对飞机造成谐波干扰的概率仅在百万分之一。伴随着科技的进步与发展,飞机制造水平逐渐提高,抗干扰能力有了很大的提高。况且到目前为止,没有一个因手机原因导致空难的确凿证据。因此解除禁令乃大势所趋,水到渠成。

航班解除手机禁令凸显服务理念的转变。随着个人智能电子设备和互联网的普及,网络已经成为重要的社交平台,社会公众对空中互联网体验及使用便携式电子设备,特别是手机的需求越来越强烈。在竞争激烈的广阔市场面前,各大航空公司不再保持着说一不二、不容置疑的垄断面孔,而是把提供优质服、提升旅客出行体验作为工作目标,以顾客为本,在提高运行效率,保障飞行安全的基础上,旅客可以体验空中社交通讯、视频通话、空中购物等上网服务与全球领先的空中实时支付服务,中国民航空中乘机体验徐徐掀开崭新一页。

值得注意的是,东航公告也有一些细化措施与明确规定,如需打开手机飞行模式,关闭蜂窝移动通信功能。在低能见度飞行阶段等特殊情况下,或当飞行机组发现存在电子干扰并怀疑该干扰来自机上人员使用的便携式电子设备时,有权要求关闭这些便携式电子设备等,对此,旅客要充分知晓,照章办事,维护飞行安全。

航班解除手机禁令标志多项进步。希望为人民服务、提高服务水平的务实态度,从小手机禁令辐射到整个航空系统乃至各行各业,使我们的生活越来越美好。

滥权导师污染学术教育圣洁

杨宝德,这位来自湖北农村的西安交通大学药理学博士生,2017年12月25日在灞河溺亡。故事并未就此结束,其女友在网上发表了题为《名校博士不堪导师奴役自杀身亡,导师冷漠无情不闻不问》的文章,质疑男友之死。记者获得的聊天记录显示,导师周教授对杨宝德明确提及或暗示的要求还包括:浇花、打扫办公室、拎包、拿水、去停车场接她、陪她逛超市、陪她去家中装窗帘等。(1月17日《中国青年报》)

在学术的江湖,杨宝德之死揭开的是或许另一种权力滥用的明规则。

有案可稽的疑似线索里,刻画出一个叫人匪夷所思的导师形象:早上要去停车场接,拎包送水;还要陪酒吃饭、逛超市;帮她家打扫卫生,喝醉后还得陪打麻将……博士生一年级下学期,周教授甚至让杨宝德考虑给自己熟人的女儿做家教。她在短信中说,“我觉得你现在没有什么太忙的事,一周如果给她辅导3次,每次2个小时,100元/次,这样对你来说轻松也能挣些钱补贴一下。”这些早就悖逆了师生关系底线的权力压榨,作为学术的杨宝德有一丁点

拒绝的权利和自由吗?

除了逆来顺受,大概别无退路。实名举报?别做梦了,这就跟医生举报医药代表、职工举报老板一样破釜沉舟,除非你真不想干了。换个导师?更是天方夜谭,大家都在一个熟人版图上,你想换,谁敢收呢。干脆不读了?十年寒窗苦,熬了这么久,让一个农村孩子放弃博士学业,估计跟杀了他也没什么区别。

虽然很难证明这种扭曲的师生关系与杨宝德之死之间有怎样的逻辑关系,但于情于理来说,让一个很有学业抱负的男青年扮演“男仆、家佣、家教”等多种私人角色,这不是权力任性是什么?联想到北航陈武教授与对外经贸大学薛原教授的桃色事件,再联想到学术界顶级期刊的《Science》杂志在其官网上发表的《博士生们面临严重的精神健康问题》——阴郁诡谲的师徒关系,在中国高校顶尖人才培养图景中,还算是小概率的偶然吗?

两重错误,昭然若揭。第一,是身份错位。封建年代的传统师徒关系,才是人身依附之下的伦理关系。所谓“一日为师终

身为父”,也因此,“投师”才成为“学艺”的逻辑前提。可现在的什么年代?堂堂的国字号重点大学,师生关系弄得像私塾一样,高校治理体系散发出怎样的可疑气息?

第二,权利救济错位。导师与学生之间,“指使”总有边界。像周教授这样无法无天的颐指气使,固然是少数;但值得反思的是,在制度救济的通道里,我们给杨宝德留下一条生路了吗?答案恐怕未必乐观。学生成了导师的小工、成了导师的廉价劳动力,甚至沦为各种工具和道具,在眼下的高等学府或科研机构,还算少见见闻吗?福柯的“权力系谱学”里,提出一个基本的论点:一个人的权力之恶,能映射一个权力失控的图谱。在博士培养等权力较为“自由”的师生关系中,如果导师在制度上处于“失控”状态,其性格必然乖戾、其脾气必致嚣张、其作为必会失衡。

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在高校治理结构中,严肃调查那些滥权的导师,并将其权力关进制度的牢笼,这才是止歌悲剧的治本之策。杨宝德之死,或才有正面的价值。



假药案动辄“特大”警示我们什么?

□罗志华

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最近审结一起特大生产、销售假药案,涉案人员在一年半的时间里,拉拢医生“搭桥牵线”,向全国30个省份的患者销售抗癌类假药达数十种,总金额超千万元。经权威机构鉴定,这些抗癌药均系假药,有的根本不含有效成分。(1月17日中国新闻网)

在近年已查获的假药案中,可称为“特大”的案件就达到数起。深圳这起案件的涉案金额虽已高达千万元,但与其他很多同类案件相比,仍属“小巫见大巫”。比如,2015年3月,马鞍山曾侦破一起特大制假“伟哥”案,涉案金额高达4.4亿。几个月后,浙江和广州等地侦破一起跨国制假药案,查获假药50多吨,案值近10亿元。2016年,山东查获的非法疫苗案,其案值也高达5.7亿元,等等。

假药案动辄“特大”,动辄跨省甚至跨国,原因是什么?最直接的原因,当然是这些犯罪分子无法无天,为了赚钱不惜践踏健康甚至生命。因此,从犯罪分子身上

找原因,进而加大对他们的打击力度,形成强大的震慑力,应该成为假药案带给我们的直接警示。

但更要看到,这些案件透露出诸多共性信息,对这些信息进行分析,对提前做好假药案防范有好处。假药案的涉案人员无不深谙患者的心理,比如很多假药案涉及“性药”,钻的就是患者有难言之隐的空子。不少假药都针对重病甚至绝症患者,原因在于这些病本就不好治,假药无效甚至副作用导致的后果,就会被疾病所掩盖。此外,很多人认为药价越高疗效也越可靠,进口的都是好药,这些观点也给不法分子以可乘之机,以至于进口药和贵重药品成为制假售假的“重灾区”。

在这起案件中,抗癌药、进口药、贵重药,这些因素都已齐备,是渗透患者心理的典型案。从患者的角度来防范假药,首先应该端正用药心态,摒弃一些错误的观念。当然,这方面也与药品政策、与药企的创新和仿制能力有关,当国产药缺乏

相应品种、仿制药的效果不佳、正规进口药价格昂贵时,巨大的利益就会驱使不法分子铤而走险,打击一批仍会来一批。尽量丰富国内药品市场,大幅压低抗癌药等昂贵药品的售价,方能釜底抽薪,从源头做好防范。

此外,互联网的隐蔽性与便捷性,也给假药案“做大”的空间。网络缩短了距离,假药生产线即使深藏偏僻场所甚至远在海外,也不会影响销路。而线上交易又十分隐蔽,给调查取证造成了极大的难度。在深圳这起案件中,制假在境外,售假又在境内境外、线上线下反复切换,追踪取证的难度可想而知。

假药案的区域跨度越来越大,隐蔽性也越来越强,传统的打击监管手段,已越来越不适应当前形式,必须区域联动、线上线下结合,出台更适应互联网时代的打击监管新办法,形成事前防范、事中监管、事后打击的全链条模式,方能让制假售药行为无所遁形。

感恩教育就是“集体下跪”吗?

□祝建波

1月14日,山东临沂莒南县某中学“感恩教育”视频热传,一女子带着哭腔演讲,指挥百余学生向父母磕头。该校负责人称,跪拜父母是“中华民族优良传统”,为让学生感恩。(1月17日澎湃新闻)

“羊有跪乳之恩”,感恩是做人的起码修养。我们的教育,就应该让孩子们明白,一个人的人生,正是因为有了许多“他人”——包括父母、老师、朋友等的给予、关爱与帮助,才有可能取得成功、收获幸福。我们在看到自己的努力与付出的同时,还要用美好的言行感恩、回报这些“他人”。

但令人匪夷所思的是,在一些地方,下跪、磕头和流泪成了感恩教育的“标配”,如此形式化甚至涉嫌炒作的东西往往轰轰烈烈而来,也会倏忽而去,因此传导到孩子身上的正能量到底有多少,恐怕还是

不能过于乐观。也就是说,尽管学校教育孩子感恩父母的初衷,无疑是好的,但要求学生在大庭广众下集体下跪,如此做法,笔者不能苟同。

众所周知,古时候流行跪拜之礼,是因为当时人们有“席地而坐”的习惯。然而随着封建礼制的扩张,跪拜礼逐渐演变成了等级尊卑差别的一个标志,下跪这一简单动作,竟然也包含着等级、权力、献媚等复杂成分。

文明的继承和发展以及文化的弘扬和繁荣,都不是一个简单的“拿来主义”。现代人要以一种深度的历史责任和历史自觉,来审视传统文化的价值,并学会去粗取精、去伪存真。跪拜即便不全是糟粕,但用它来诠释对父母的感恩,笔者认同作家、教育学者叶开观点:“这种方式违背孩子的意愿,强迫孩子做这样的事

情,有违《未成年人保护法》。孩子对父母的爱可以有各种方式表达,但不是这种被要求下跪的可怕方式。”

此外,教育专家尹建莉也说:“教育是件‘桃李不言,下自成蹊’的事,需要‘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地解决”。孩子孝敬父母,懂得感恩,需要教育引导和日积月累,我们的教育更多地应该是让孩子走到实践中去,领悟父母的点滴之恩,用自己的实际行动来报答。感恩,不需要轰轰烈烈,但感恩的方式一定要真诚,唯有触及心灵的教育才能真正带来成长,绝不能只是形式上的一种复古。

因此,我们必须看到,在现代文明里,不论成人和孩子,做任何事情只有心甘情愿才能认真做好,靠一场集体下跪秀逼出来的“感恩”,只能是昙花一现,其最终结果肯定也不过是在缘木求鱼罢了。